

社会资本的效用分析： 以对城市居民普遍信任的影响为例

邹宇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北京 100732

摘要：社会资本在个体行动和目标的达成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线性关系还是曲线关系却鲜有研究。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的普遍信任具有边际效用型的曲线关系，亦即，随着社会资本的增长，其对普遍信任的效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便趋于平缓。这个发现对行动者及政策决定者在有关社会关系建构和社会资本投资的考量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社会资本；普遍信任；曲线效用

作者简介：邹宇春，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关系与信任、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与家庭、青年与老年等。

基金项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制度信任内部差异及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收稿日期：2014-12-30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5)03-0070-11

社会资本形成于行动者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内，是游离于正式关系之外却又离不开正式关系的社会资源。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无处不在，即梁漱溟^[1]所说的“关系无界”。只要有关系存在、只要社会结构存在等级差别，社会资本就可能对个体、对社会发挥作用。多数研究已表明，社会资本对于认识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连接微观和宏观世界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尤其在研究就业求职、家庭与青少年行为、就学和教育、社区生活、民主和管治、经济发展、集体行动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时，学者们发现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3]。

鉴于社会资本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多数研究建议行动者应重视社会资本的建构，加大社会资本的投资。此类建议的前提假定是经济资本的数(质)量不断增加则其作用不断加大的线性关系同样适用于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越多则其效用越明显。然而，问题在于，社会资本是较为特殊的资本，它没有具体的形态，并且不归行动者所有，行动者只能通过维护或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来维持或获取新的社会资本，而行动者拥有关系网络的规模会因生理能力的限制而具有一定的范围，这导致社会网络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其内嵌的资源可能会有极大的重复

性而影响效用的线性增长。遗憾的是，社会资本是否与其效用存在曲线关系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实证研究。

此外，信任对于个体生活和社会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没有信任，个体的基本活动无法进行，社会体系容易坍塌^[4]。随着当前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相对于形成于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在日常行动和态度决策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有关普遍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变得尤为重要。然而，虽然个体的社会资本对于调节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认知和态度，以及相应的行动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囿于有关社会资本和信任的关系争论未有定论，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作用也一直未能得到澄清。

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城市居民的普遍信任入手，分析社会资本的效用是否存在曲线关系，尝试弥补上文提及的两点不足。本研究首先梳理当前有关社会资本的效用和信任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在提出研究假设后呈现相关变量、数据和分析模型，并在解释研究结果后，做出相应的总结和讨论。

一、社会资本的效用：线性还是曲线

目前，关于社会资本效用的研究中，占主流

的观点是社会资本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在就业市场,格兰诺维特最先将弱关系的强度引入求职过程的研究中。他的研究表明,使用社会网络能帮助找到更好、更满意的工作。“弱关系”作为连接不同社会群体的桥梁(social bridge),能带给找工作者新的、不重复的工作信息^[5]。林南等进一步提出,找工作过程中动用的社会关系(contact)及其提供的资源可以帮助劳动力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6]。伯特也指出,嵌入在职业精英网络中的男性更容易获得职业升迁^[7]。在精神健康方面,个体的收入会影响他们对自己健康的评价,但这种自我健康评价受到社会资本的调节^[8]。至于其他方面,相比社会资本低的社区,生活在高社会资本社区内的个体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好的公共福利,低成本监督邻里行为,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更温和地解决争端,因此个体可以生活得更安全、更富有、更有文化、更有序管理以及更幸福^[9]。

除发现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之外,部分学者也极力强调不可忽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downside effects)^[10],并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考察点。第一,学者们从外部性研究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由于社会资本内嵌于网络关系内,其作用受到网络规模和资源归属的限制,亦即社会资本对组内人起积极作用,但对组外人起到排斥和隔离的效果。换句话说,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中观(如,组织)或者宏观(如,国家)层面上的一种“负的外部性”消极结果^[11]。这种考察点下的社会资本消极效用对行动者来说,社会资本仍是有益的。第二,学者们也从个人层面考察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用,认为社会资本不仅仅起积极作用,对于行动者,可动员和涉及的社会资本很可能阻碍其行动目标的达成。主要原因在于,行动者往往因为自身条件的不足(如,具有较低的人力资本或金融资本等)而需要动用社会资本,但这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又使得行动者社会网络的质量和数量都不理想,因此通常很难借助社会资本实现目标,并常常引致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在中国,赵延东分析下岗工人社会资本运用与再就业的关系时也发现,在劳动力市场制度确立后,下岗职工通过社会关系而获得的职业质量更低(即工资收入更少、社会声望也更低)^[12]。

从以上分析可见,社会资本对社会存在促

进和消减的两类作用,但强调的都是社会资本的线性效用,然而,社会资本的积累并非呈线性增长。比如,格雷森等发现社会资本量随着年龄升高而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逐渐减少^[13]。那么,在某些研究情境和研究主题下,社会资本的效用是否会出现曲线关系,则很值得研究^[14]。

在经济学中,边际效用理论提出,衡量物品的价值应看其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存在递减的规律,亦即,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个单位商品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是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这种效用增加的速度会随着持有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15]。这个理论说明,无论某事物对行动者产生何种效用,这种效用的增加速度会因为行动者对这种事物拥有量的增加而逐渐放缓。“边际效用”理论解释了事物效用变化的一种规律,它强调任何事物带给使用者的满足度会因需求的有限性而逐渐降低。换言之,任何事物对社会产生的影响都不会因为数量的无限增长而等量地增加或减少,其效用变化的速度是逐渐变缓,并趋于零。而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的关系,类似于个体通过“消费”社会资本这种商品而换取得到普遍信任这种感受。当个体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以得到对陌生他者的认知和抗拒风险的能力时,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判断以及自我抗拒风险的评估在到达一定程度后就逐渐定型,再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因此,随着社会资本的增长,促使普遍信任增长的速度也会逐渐放缓。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很可能也存在类似边际效用曲线的关系。

中国情境下,张顺和程晨提出,社会资本是人们对社会关系的投资,应该能产生工具性回报,也必然存在收益回报率的问题。社会资本含量升高会促进收入回报增多,“但同时维持社会网络的成本也越高,而且社会网络的作用空间也会逐渐衰减,使得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回报率逐渐减小。”他们将社会资本视为社会行动者为实现工具性目的的重要途径,并根据社会资本的工具体效效果差异将其分成“动员性与非动员性社会资本”,并进一步分析这两类社会资本对收入的作用空间。结果发现,两类社会资本与收入呈现倒U型关系,即两类社会资本的会增加带来收入的增加,但到达一定程度后,“如果继续依赖社会资本”,“个体的收入

回报会最终呈现下降趋势”^[16]。此外,林聚任和刑艳的研究也证实倒U型效用观点,他们的数据分析显示,作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上海地区的社会网运用存在回落的情况^[17]。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发挥的效用可能是曲线的。那么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效用是否是曲线,若是,属于倒U型,或是边际效用曲线,有待证明。

二、信任与社会资本

由于学术界就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尚未统一,社会资本和信任的关系也因此稍显模糊,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应该把这两种概念分开对待^{[18][19]}。本研究也认为,从微观层面看,信任是个人所拥有的信念或预期,是对他人的一种判断,可供个体支配以指导行动。即便不接触被信任对象,个体也可能对其投入信任。但社会资本并不属于行动个体,单个行动者本身无法产生社会资本,它建立在个体与他者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属于网络成员。因此,两者无法等而论之,社会资本和信任应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来考量,在测量和概念化时都应有区分^[20]。

事实上,社会资本和信任不仅应被看做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资本还会影响信任的生成^[21]。有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可以催生理解,同情心,信任的社区^[22]。威尔森认为社会资本可实现信任型经济转型^[23]。社会资本促成了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进而增强了集体行动的效率^[24]。不过,这类研究还较少从社会资源视角出发去考察社会资本对信任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遍信任。

考虑社会资本的作用时,不仅仅要考虑社会网络的结构特性,更要考虑社会网络所承载的资源内容。林南指出,社会资本依赖于社会网络,但却不等同于社会网络,网络特性的变化影响了网络内可承载的社会资源容量。社会网络能影响个体的行动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网络本身,还在于社会网络内有多少资源可供行动者借取或动员^[18]。不过,嵌入在社会网络内的社会资源却并不为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本是嵌入在行动者的社会关系内的资源,只能够被行动者动员和借取,并不归属于行动者。社会资本应被看做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的共同体。鉴于很少有研究从“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可行

动者动员或使用的资源”视角来考察社会资本对信任的影响^{[25]107-132},本研究认为有必要把社会网络关系及其内嵌的资源看做共同体来考察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

格兰诺维特认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经济行为能够产生信任。他强调,社会网络不必然在经济行为中产生信任,经济行为只有在直接接触的社会网络以及特定情境下才会产生信任,并且普遍道德和社会制度不能带来信任。不过,他只分析了经济行为中的信任是如何产生的(经济行为发生意味着两者要接触,且有直接的利益交换发生),并没有解释那些没有接触或初次见面的个体之间的信任缘起,也没有解释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从何而来^[26]。本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及其资源是个体普遍信任存在差异的有力解释因素。即便与陌生的他者没有接触,个体的社会网络也可能嵌藏相应的资源和信息供其形成对陌生他者是否可信的判断。同时,根据“相对易损性”理论,网络资源越丰富,个体越有抗拒背信风险的能力,亦即“潜在损失”在受损者可动用资源中所占的比例越小则越可能相信他人。贺梅也认为信任关系的核心要素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易损性(vulnerability)。她认为,在解决信任问题时,行动者用来减少不确定性或易受损性的策略依赖于信任问题产生的特定环境背景。在较传统的社会,个体倾向减少有关他者动机及能力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为减少对他者给以信任时所带来的风险,个体更多是通过加强对他者可信性的认知来达成。传统社会的社区较为封闭,这种认知较易达成。但现代社会的个体必需同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打交道,致力减少自身的易受损性变得更为重要^{[27]40-89}。

三、社会资本的多维度视角

无论是何种研究视角,社会资本的概念都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相关测量也呈现多维度趋势,换言之,社会资本很难用一个向度的指标来测量清楚^[28]。邹宇春和敖丹认为,从社会资源视角出发,社会资本应是多维度的:嵌入在不同类型网络内的资源构成了个体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在不同情境下发挥不同作用。亦即,这些功能各异的社会网络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29]。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资本对信任的影响,本研究赞同在测量社会资本

时应采用一个多维度的视角。而定名法(如,讨论网)和定位法(如,职业网)作为常用的测量工具,可分别捕捉个体不同的社会网络,嵌入在内的社会资本的效用也理应各有不同。

定名法测量到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在强关系社会网络内的社会资源,它可以测量网络性质、网络成员的构成以及网络内可能动员的各种资源。测量到的社会网络是个体的核心网络,其网络成员具有亲密、同质以及经常接触等特点,这些人构成了个体最直接的社交圈。由于亲密性和信息的重复性,网络内的成员更多地具有情感分享和资源维持等特点。此工具测量的社会资本具有重复信息占多数的特点。定位法测量工具并未对关系强度进行界定。被调查对象与其提及的网络成员间的关系强度跨越较大,可能非常紧密,可能一般,更可能仅是认识关系。此网络的资源非常丰富,具有明显异质性,可来源于家人、朋友或是一般人。除了情感维度的测量,此工具也能通过测量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职业信息而捕捉个体社会资本的工具性维度。从资源的异质性和来源看,嵌入在这种网络内的社会资本能对个体的工具性行为产生影响,其内嵌的信息以非重复、新信息占多数为主。本研究把通过定名法测量的社会资本称为讨论网社会资本,而通过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测量的是职业网社会资本。本研究主要分析这两种维度的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是否产生不同的影响,以及哪个维度对普遍信任的作用更大。

四、研究假设

同样的网络结构及其内嵌资源,会对于人们不同类型的行动会产生不尽相同的后果^[16]。张顺和程城在研究中发现,社会资本对收入存在倒U型效用^[29]。收入属于经济领域,但信任不是。作为一种对他者的积极“预期”,社会资本对信任的效用空间是否也呈现类似曲线的关系,很值得研究。根据以往的文献研究,本研究认为生活在相同文化或社会背景下的个体,其普遍信任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可从社会关系网络内动员何种资源。网络资源的多寡可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对被信任对象的可信任特征的判断,也可影响个体抗拒背信风险的承受能力。换句话说,个体可从网络动员的资源越多,则越可能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识别自己与陌生人

的相似性,具有更高层次的相对易损性,也越可能对陌生人的可信任特征做出积极的判断。不过,依据边际效用理论和社会资本效用空间理论,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对信任的效用空间可能呈现如下曲线特征: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普遍信任程度也逐渐升高,但这种升高趋势会逐渐放缓,无限地趋于某个值,即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边际效用在递减,每单位社会资本所带来的普遍信任增加度在减少。换言之,以各种信息和资源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对信任主要起积极作用。只不过,当判断某事物所需要的信息量逐渐趋于饱和时,增加新的信息对判断所起的促进作用会越来越微弱。此外,拥有越多的资源,个体抗拒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但当资源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抗拒风险的能力不会再明显增加。

假设1: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存在曲线影响,其效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的速度越来越慢。

假设1-1:随着讨论网社会资本的增加,普遍信任上升;不过,社会资本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普遍信任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平缓。

假设1-2:随着职业网社会资本的增加,普遍信任增加;不过,社会资本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普遍信任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平缓。

由于两种测量方法在设计理念上存在不同,两种方法测得的网络构成和嵌入资源所能实现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定名法测得的“讨论网”多由亲密朋友、亲属、关系较强的他者(others/contacts)组成。它以测量“强关系”(strong tie)为主,较少能测量到“弱关系”(weak tie)。网络成员的交往度和熟悉度都较高,拥有资源的相似性也要高于弱关系。这些较同质(homophilous)的资源给个体提供了一种相对熟悉、稳定的环境,有利于个体实现维持原有资源、获得心里支持等表意性(expressive)活动^[30]。而定位法根据职业声望得分设置的职业列表代表了当前社会的大部分职业,覆盖当前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测得的网络由亲属、朋友、一般认识的人等组成,包括“强关系”和“弱关系”,可给个体提供不重复(nonredundant)信息、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教育、法律、技术等等)的较异质(heterophilous)的资源 and 影响力,有利于个体实现工具性(instrumental)行为,完成新目标。相比之下,讨论网内能提供的陌生人信息有限

但却能提供其他资源支持以抵抗背信的风险,而职业网由于覆盖了不同性质的交往对象和信息资源,它可以测量到中国化下亲、熟、信三位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以亲属为核心但又远远延展到亲属关系之外^[31],它在信息供给和提高抗拒背信风险的能力上能都给个体强有力的支持。因此,本研究认为两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都存在影响,但在影响强度上存有差异。

目前,关于两个测量工具能测到不同网络资源的讨论已非常成熟,但他们在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上是否存在差异,存在怎样的差异尚未可知。尤斯图拉和蔻里在分析公民参与和特殊信任时指出,个体若和同种族社区的联系紧密,容易使个体粘着在同族群内部,而排斥外来的陌生人,与不同种族的联系有利于普遍信任^[32]。也就是说,强关系不利于普遍信任的生成。李沛良等在分析社会网络对健康的影响时,发现个体在遇到与情绪有关的问题时大多向朋友、同事倾诉,而不是向家人寻找帮助,亦即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解决与情绪、思想状态有关的问题^[33]。在中国家庭里,传统的家长制和等级制血缘结构使得个体不太愿意在亲密关系里分享情绪问题^[34]。由此,本研究认为以测量强关系资源为主的讨论网社会资本在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上应该弱于职业网社会资本。相关假设如下。

假设 2: 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存在效用差异,且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大于讨论网社会资本。

五、数据、变量和分析模型

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中的 2003 年(CGSS2003)数据^①。此数据覆盖了除港、澳、台、藏、青、宁之外的全国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查只包括城镇,共涉及了 125 个县级单位,559 个居委会。调查采用 PPS 抽样,从省级单位抽到社区,再在每个社区以系统抽样抽取 10 个调查户,最后在每户抽取 1 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 16~78 岁的在被调查户内居住了一周以上或将居住一周以上的成年人,共抽取 5 900 人,实际完成问卷 5 894 份。

分析软件为 Stata 11。除了被访者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以外,本研究中主要用到的部分包括个人信息、社会流动与社会网络,以及评价与认同等三部分。其中,个人基本情况部分涵盖了解被访者本人的一些情况,包括他/她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工作单位和个人收入等。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部分主要了解被访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讨论网社会资本和职业网社会资本的测量。评价与认同部分主要是了解被访者对于社会上其他人或群体的看法。

本研究的自变量有两类:讨论网社会资本和职业网社会资本。测量讨论网时,用到的测量问题是“E1:大多数人时常会和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这些人,可以是自己的配偶、家人、亲戚、同事、老同学、邻居、朋友及其他人等。在过去半年内,您和谁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请你说出所有这些人的姓或简称,如老张、小李、王姨、老伴等。”得到的指标有网络规模(size)、亲属比例(kin-proportion)、网络密度(density)、年龄异质性(age heterogeneity)、教育异质性(educational heterogeneity)、性别异质性(sex heterogeneity)等^[30],得到以上指标后,在因子分析中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极大旋转法对这些指标做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两个代表讨论网社会资本的因子。已解方差达到 58%。研究分别称它们为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二因子。测量职业网社会资本时,用到的测量问题是“E3: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亲密朋友和其他人大概有多少人?E4:他们里面有无从事下列职业、在下列单位类型里工作的人?”此测量工具是在定名法基础上,根据中国情境做了本土化的相应改动。本研究测量的相关指标如下:拜年规模、拜年密度、职业规模、职业总分、职业网距、知识层纽带、领导层纽带、经理层纽带^{[29][16]}。此后,通过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极大旋转法)对这些指标做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一个因子,本研究称其为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已解方差达到 58.6%。

由于本研究要验证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效用呈类似边际曲线的关系,故还需对生成的社会资本因子做自然对数转换。因子分析后生

① 2003 年度的调查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的第一期,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和共同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方面由李路路教授担任主持人,香港科技大学方面由边燕杰教授担任主持人。感谢数据方提供数据,本论文的观点和内容由作者自负。

成的因子是标准分变量,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本研究首先将其转化成最低值为 1,最高值为 100 的分值,然后对其取自然对数。普遍信任是因变量。由于普遍信任是对有关陌生人或者说社会大多数人的信任,这个变量的测量完全不同于特殊信任的测量。目前,有关此变量的测量大多采用一个问题,“通常,你是否认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可以信任,或者是与人相处时最好要小心谨慎?”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GSS)以及每一次的“世界价值调查”都采用了这个问题。根据以往研究,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年龄二次项、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党员身份、月收入、居住年限、地区虚拟变量(东部虚拟变量,中部虚拟变量,西部为参照组)等作为控制变量。

分析采用逻辑斯特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并对因变量进行标准化。首先,分析讨论网社会资本的两个因子对普遍信任的影响,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接着,验证两类因子取自然对数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是否显著,此模型是否显著优于前一个模型;最后,将两类因子作为自变量放入模型,比较分析他们的效用大小。验证讨论网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模型如下:

$$y = b_0 + c_1z_1 + \dots + c_{10}z_{10} + b_1x_1 + b_2x_2 + \varepsilon$$

其中 y 为信任程度; c_n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z_n 为控制变量(z_1 为性别, z_2 为年龄, z_3 为年龄二次项, z_4 为教育年限, z_5 为月收入, z_6 为婚姻状况, z_7 为党员身份, z_8 为居住年限, z_9 为东部, z_{10} 为中部); b_n 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x_1 为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对数值); x_2 为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二因子(对数值)。

验证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模型如下:

$$y = b_0 + c_1z_1 + \dots + c_{10}z_{10} + b_1x_1 + \varepsilon$$

其中 y 为信任程度; c_n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z_n 为控制变量(z_1 为性别, z_2 为年龄, z_3 为年龄二次项, z_4 为教育年限, z_5 为月收入, z_6 为婚姻状况, z_7 为党员身份, z_8 为居住年限, z_9 为东部, z_{10} 为中部); b_n 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x_1 为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对数值)。

六、研究结果

尽管多层次分析模型可以同时分析宏观和微观的效用及其交互作用,但本研究的兴趣在

于发掘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个人普遍信任的影响,因此采用逻辑斯特回归分析,通过加入地区宏观变量来控制地区的差异。样本情况为(具体见表 1):男性占 48.1%,女性为 51.9%;平均年龄为 44.4 岁,标准差为 13.1;在本地的平均居住年限为 30.2 年;从婚姻状况看,从未结婚者占 10.6%,已婚者占 89.4%;样本人群的平均教育年限为 10.4 年,月收入平均为 0.8 千元;中共党员人数比非党员人数少,两者相差 62.8%;分地区看,东部人群占 53.8%,中部占 28.8%,西部最少,为 17.4%。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百分比或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性别			5 894
男	48.1%		
女	51.9%		
年龄	44.4	13.1	5 894
居住年限	30.2	16.9	5 131
婚姻状况			5 871
在婚	89.4%		
非在婚	10.6%		
政治资本			5 778
中共党员	18.6%		
非中共党员	81.4%		
地区			5 894
东部	53.8%		
中部	28.8%		
西部	17.4%		
教育年限	10.4	3.7	5 888
月收入(千元)	0.8	1.4	5 304

1. 讨论网社会资本和职业网社会资本均对普遍信任存在显著影响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年龄二次项、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党员身份、月收入、居住年限、地区虚拟变量(东部虚拟变量、中部虚拟变量、西部为参照组)构成基准模型 1,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讨论网社会资本因子(两个)和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一个),得到模型 2。

统计结果显示(表 2),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显著,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显著,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二因子不显著。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优势比增加 0.093 个标准差,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优势比增加 0.068 个标准差,说明两个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因子均对普遍信任产生影响。

表2 两维度社会资本因子对普遍信任的逻辑斯特回归分析

	基准模型1	普遍信任模型2	普遍信任模型2-1	普遍信任模型2-2
性别(1=男性)	0.213*** (0.072)	0.273*** (0.093)	0.266*** (0.087)	0.201*** (0.080)
年龄	-0.017*** (0.004)	-0.018*** (0.005)	-0.018*** (0.005)	-0.016*** (0.004)
年龄二次项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教育年限	0.049*** (0.012)	0.057*** (0.016)	0.057*** (0.014)	0.045*** (0.013)
婚姻状况(1=已婚)	-0.063 (0.155)	0.063 (0.189)	0.069 (0.180)	-0.026 (0.168)
党员身份(1=党员)	0.039** (0.022)	0.153 (0.118)	0.224** (0.110)	0.145 (0.102)
月收入	0.240*** (0.093)	0.025 (0.025)	0.028 (0.024)	0.024 (0.022)
居住年限	-0.001 (0.003)	-0.002 (0.003)	-0.001 (0.003)	-0.002 (0.003)
地区变量(西部为参照组)				
东部	0.422*** (0.102)	0.250** (0.130)	0.301*** (0.120)	0.370*** (0.112)
中部	0.176* (0.109)	0.038 (0.132)	0.055 (0.123)	0.138 (0.118)
拜年网社会资本因子		0.093** (0.046)	0.128*** (0.040)	
讨论网社会资本因子		10.068* (0.046)	0.058* (0.042)	
讨论网社会资本因子2	-0.059 (0.047)	-0.110*** (0.043)		
样本量	4 479	2 718	3 176	3 613
拟系数	0.035	0.043	0.041	0.035

注:(1)系数是因变量标准化后,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得到的因变量优势比的标准化的变化值;(2)括号内是标准误;(3)*** $p < 0.01$, ** $p < 0.05$, * $p < 0.10$

考虑两类社会资本因子存在高度相关,分别把两类维度的社会资本因子放入基准模型1中,得到模型2-1和模型2-2(表2)。模型3结果表明,讨论网社会资本维度的两个社会资本因子作用均显著,但作用相反,第一因子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的优势比会增加0.058个标准差,但第二因子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的优势比减少0.110个标准差。仅从作用强度看,第一因子对普遍信任的效用仅仅是第二因子的一半。模型4统计结果表明,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对普遍信任作用显著,前者增加一个单位,后者的发生比对数值会增加0.128个标准差。

把基准模型1分别与普遍信任模型2、模型2-1,以及模型2-2做嵌套模型比较,结果发现加入社会资本因子后的模型与基准模型1显著不同。基准模型1与模型2的嵌套显著检验,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 $LR\ chi2(3) = 12.13$,且 $p = 0.0069 < 0.05$ 。与模型2-1的嵌套显著检验,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 $LR\ chi2(2) =$

11.11, $p = 0.0039 < 0.05$ 。与模型2-2的嵌套模型显著性检验,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 $LR\ chi2(1) = 12.37$, $p = 0.0004 < 0.05$ 。可见,用社会资本来解释普遍信任的差异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社会资本的倒U型曲线关系未得到证实

鉴于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工具性领域存在倒U型曲线,本研究将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因子取二次项放入方程,得到模型3。统计结果显示,三个因子的二次项均不显著。其次,将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因子分别放入基准模型1中,统计结果仍显示,二次项均不显著(表3)。这

表3 社会资本二次项对普遍信任的逻辑斯特回归分析

	普遍信任模型3	普遍信任模型3-1	普遍信任模型3-2
性别(1=男性)	0.309*** (0.093)	0.221*** (0.080)	0.302*** (0.087)
年龄	-0.020*** (0.005)	-0.017*** (0.004)	-0.021*** (0.005)
年龄二次项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教育年限	0.064*** (0.016)	0.048*** (0.013)	0.065*** (0.014)
婚姻状况(1=已婚)	0.061 (0.189)	-0.039 (0.168)	0.071 (0.180)
党员身份(1=党员)	0.174 (0.118)	0.162 (0.102)	0.251** (0.110)
月收入	0.027 (0.025)	0.027 (0.022)	0.030 (0.024)
居住年限	-0.002 (0.003)	-0.002 (0.003)	-0.001 (0.003)
地区变量(西部为参照组)			
东部	0.280** (0.130)	0.409*** (0.112)	0.338*** (0.120)
中部	0.044 (0.133)	0.161 (0.118)	0.063 (0.123)
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	0.079* (0.046)		0.068 (0.042)
第一因子二次项	-0.023 (0.041)		-0.035 (0.037)
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二因子	-0.072 (0.048)		-0.124*** (0.044)
第二因子二次项	-0.041 (0.042)		-0.023 (0.038)
拜年网社会资本因子	0.115* (0.062)	0.180*** (0.051)	
拜年网因子二次项	-0.009 (0.035)	-0.038 (0.031)	
常数项	-2.165*** (0.331)	-1.931*** (0.278)	-2.261*** (0.300)
样本量	2 718	3 613	3 176
拟系数	0.043	0.041	0.036

注:(1)系数是 Logistic 回归系数;(2)括号内是标准误;(3)*** $p < 0.01$, ** $p < 0.05$, * $p < 0.10$

说明社会资本在信任领域不存在倒U型效用,即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的关系可能并不是“随着社会资本升高而普遍信任也升高,但升高到一定程度后转成下降趋势”。

3. 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边际曲线关系得到证实

在统计图形中,自变量取自然对数后与因变量的关系形态是:随着自变量增加,因变量也不断增加,但增长的速度在逐渐放缓。因此,本研究对两个社会资本维度的因子做了自然对数变化^①。具体来说,鉴于各个因子的均值为0,标准差为1,取值在正负1之间,故先把因子转换成百分比方式^[31],再把三个社会资本因子均变换成自然对数形式。在基准模型1的基础

上,本研究同时纳入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的对数、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二因子的对数、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的对数,得到模型4。统计结果表明,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的对数显著,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的对数显著,但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二因子不显著。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的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的优势比增加0.117个标准差;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的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的优势比增加0.349个标准差(表4)。将此模型与基准模型1做嵌套模型比较,似然比较检验结果显示 $LR\ chi2(3) = 16.99, p = 0.0007 < 0.05$ 。可见,放入自然对数形式的社会资本因子后,模型的解释力度更大,且这种改善非常显著。

表4 两维度社会资本因子自然对数对普遍信任的逻辑斯特回归分析

	普遍信任 基准模型 1	普遍信任 模型 4	普遍信任 模型 4-1	普遍信任 模型 4-2
性别(1 = 男性)	0.213*** (0.072)	0.271*** (0.093)	0.269*** (0.087)	0.197*** (0.080)
年龄	-0.017*** (0.004)	-0.018*** (0.005)	-0.019*** (0.005)	-0.015*** (0.004)
年龄二次项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教育年限	0.049*** (0.012)	0.053*** (0.016)	0.057*** (0.014)	0.041*** (0.013)
婚姻状况(1 = 已婚)	-0.063 (0.155)	0.046 (0.189)	0.062 (0.180)	-0.041 (0.168)
党员身份(1 = 党员)	0.039** (0.022)	0.153 (0.118)	0.229** (0.110)	0.138 (0.102)
月收入	0.240*** (0.093)	0.024 (0.025)	0.028 (0.024)	0.023 (0.022)
居住年限	-0.001 (0.003)	-0.002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地区变量(西部为参照组)				
东部	0.422*** (0.102)	0.247** (0.129)	0.298*** (0.120)	0.370*** (0.112)
中部	0.176* (0.109)	0.047 (0.132)	0.055 (0.123)	0.147 (0.118)
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		0.117** (0.068)	0.113** (0.061)	
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二因子		-0.121 (0.116)	-0.260*** (0.107)	
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		0.349*** (0.134)	0.444*** (0.110)	
样本量	4 479	2 718	3 176	3 613
拟系数	0.035	0.044	0.041	0.037

注:(1)系数是因变量标准化后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得到的因变量优势比的标准化后的变化值;(2)括号内是标准误;(3)*** $p < 0.01$, ** $p < 0.05$, * $p < 0.10$

考虑三个社会资本因子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将两类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因子对数分别

加入基准模型1。首先,将讨论网社会资本的两个因子对数,加入基准模型1,得到模型

① 自然对数是以常数e为底数的对数,以 $\ln X$ 表示,其中X必须大于0。当自然对数 $\ln X$ 中X为连续自变量时,成为对数函数,表示为 $y = \ln X$ (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自然对数log是一个连续且在似然函数的领域内严格递增的上凸函数。

4-1 结果发现两个因子都显著。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对普遍信任起促进作用,表明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发生比会增加 0.113 个标准差,而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二个因子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的发生比会减少 0.260 个标准差。两个因子的效用相反,并且,不看作用方向而只看作用强度的话,第一因子的作用仅仅是第二因子的一半,前者对普遍信任的影响要小于后者。其次,将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的自然对数放入基准模型 1 中,得到模型 4-2。结果显示,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的自然对数值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显著,前者若增加一个单位,则后者增加 0.444 个标准差。再次,把纳入了讨论网社会资本因子的模型 2-1 与加入对数转化后讨论网社会资本因子的模型 4-1 做模型最优比较,统计得到模型 4-1 的 BIC 值为 -21 996.072,模型 2-1 的 BIC 为 -21 994.078。两个模型的 BIC 值相差为 1.994,模型 4-1 得到微弱的统计支持。不过,把纳入了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的模型 2-2 与加入对数转化后职业网因子的模型 4-2 做最优比较,前者的 BIC 值为 -25 439.628,后者的为 -25 448.229,后者与前者相差 -8.601,结果证明后者得到了强烈的统计支持。

可见,讨论网社会资本和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呈现自然对数曲线形态,即从对数曲线关系看待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更为准确。换言之,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存在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带来效用的改变速度在逐渐放慢。讨论网两个因子作用相反,因子一是促进作用,因子二是减少作用,不过比较两者对标准化因变量的改变程度,增加量不足减少量的一半,说明讨论网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主要是削减作用,即随着讨论网社会资本的增加,普遍信任度反而降低,但降低的速度越来越慢。假设 1-1 得到部分证实。此外,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是增加作用,说明随着职业网社会资本的增加,普遍信任度越来越高,但增强的速度越来越慢。假设 1-2 完全得到证实。

4. 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大于讨论网社会资本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再把加入对数转化后讨论网社会资本因子的模型 2-1 与基准模型 1 做嵌套模型比较,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 LR

$\chi^2(2) = 13.10, p = 0.001 < 0.05$ 。同时,也把加入对数转化后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的模型 2-2 与基准模型 1 做嵌套模型比较,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 LR $\chi^2(1) = 20.97, p = 0.000 < 0.05$ 。两个模型都通过了嵌套模型显著性检验,不同点在于,前者的似然比卡方值小于后者。

此外,如果不考虑两类社会资本的相关性,把两类维度的三个因子对数变量同时放入模型,得到的结果显示(见表 4 中的模型 4)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数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发生比增加 0.349 个标准差;讨论网社会资本第一因子对数增加一个单位,普遍信任发生比增加 0.117 个标准差,第二因子不显著且其对普遍信任的改变量为减少 0.121 个标准差。这些数据表明,对普遍信任来说,受到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讨论网社会资本的影响。

从模型拟合优度的比较结果看,“直接用讨论网社会资本因子对普遍信任差异进行解释”模型与“用对数后讨论网社会资本因子来解释普遍信任差异”模型比较,“直接用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对普遍信任差异进行解释”模型与“用对数后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来解释普遍信任差异”模型比较,后者模型的 LR 卡方变化值更大,BIC 差异值也更大。从嵌套模型比较来看,用对数后讨论网社会资本因子来解释普遍信任的模型发生的 LR 卡方变化值远小于用对数后职业网社会资本因子来解释普遍信任的模型。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要大于讨论网社会资本,假设 2 得到证实。

七、总结与讨论

从边际效用理论看,在一定时间内,物品带给使用者的效用并不是随着物品新增数量的增多而直线增多。事实上,随着使用者心理和生理上对物品需求的欲望减弱,其每个单位增加所带来的满足程度会逐渐递减,换言之,物品的不断增加的数量带来使用者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同样,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个从无到有逐渐增加的过程,个体需要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和信息来实现对陌生人的信任判断,而最初获得的资源和信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判断的需求,但到达一定程度后再增加的资源与信息数,对个体的信任判断所需要的

基本信息理应得到满足,继续增加的社会资本很可能不再对信任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换言之,当个体对陌生人的判断在逐渐形成时,资源和信息的增加量会带给个体有显著意义的判断效用,但当基本信任已经形成时,资源和信息对信任程度增加的促进作用就变得非常缓慢。

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能发生影响,在于人与人之间有无形的联系,这种联系实现了人与人之间资源信息的流动与共享。普遍信任是对不熟悉的人、陌生人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形成需要两点条件:第一,了解有关陌生人的品质、陌生人的文化价值、陌生人所遵从的制度等等背景信息;第二,具备抗拒背信风险的资源量。然而,在完全满足这两种条件下做出信任的决定,是非常理想的状态。根据“有限理性”理论,无论个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有意识地”理性,但这种理性却是“有限的”。原因在于,个人所处的社会是复杂的,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信息也是不完备的;其次是人的判断力和认知能力都有局限性,人对事物的了解只能无限逼近但很难完全等于真实。这两点使得个体对事物的判断也是不断接近理性,但却并非完全理性。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形成过程也应如此。随着个体自身能够借用的社会资本量不断增加,意味着他能获取的有关陌生人的信息量和对抗风险的资源也在增加,对陌生人的信任判断程度也在不断增加,但并不能完全逼近真正的信任,只能呈现上升并逐渐变缓的趋势。

通过实例分析,本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效用形态实际上的确呈现对数曲线关系,即两者的关系呈现类似于边际效用曲线的形态。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它对信任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但这种影响力增长的速度会在社会资本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慢慢变弱,并趋于平缓。这个研究结果的发现将有助于更加理性地面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借用、回报等过程。作为一种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内的网络资源,社会资本是附着在人际网络关系内才能存在,并且属于关系网络内的成员所有。布迪厄指出,行动者能从网络内获得多大程度的资源帮助,取决于网络规模、网络成员拥有什么样的资源以及网络成员愿意提供资源的程度^[38]。故而大多数有关如何提高社会资本正向效用的研究都会建议行动者要积极投资社会关系网络,即通过有意识地维护或扩展自身的人脉关系来

获取有用的社会资源。但本研究的发现,为这个建议加上了一个注脚,也就是社会资本并非越多越好,更何况,本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还对行动者会有负向效应。

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行为,应该持有一定的理性,即便在中国这样讲究“关系”的社会情境里,不应盲目夸大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应避免无限制地人际关系投资行为。即便社会资本在许多领域会带来正效应,但这种积极效应的增长速度会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而逐渐变弱,过量的社会资本经营实际不仅会耗费行动者大量的精力和物力,还很可能并不能达到投资者的预期效果。无论对于行动者本身,还是政策决策者,此研究结果都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版。
- [2]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Adler, P. S., & Kwon, S. - W. 2002.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1).
- [4]Uslaner, E.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6]Lin, N., & Dumin, M.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1", *Social networks*, 8(4).
- [7]Burt, R. S. 1998. "The gender of social capital",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0(1).
- [8]Veenstra, G. 2000. "Social capital, SES and health: an individual - level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0(5).
- [9]Woolcock, M.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2).
- [10]Portes, A., & Landolt, P. 1996. "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 *The American Prospect*, 26(94).
- [11]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 [12]赵延东、风笑天《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 [13]Glaeser, E. L., Laibson, D., Scheinkman, J. A., & Soutter, C. L. (1999). *What is social capital? The determinants of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National bureau of*

-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 USA.
- [14] Subramanian, S., Kim, D. J., & Kawachi, I. 2002. "Social trust and self-rated health in US communities: a multi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79.
- [15] 李建栋 《认识价值论》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
- [16] 张顺、程诚 《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载《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1 期。
- [17] 林聚任、刑艳 《中国大城市求职网 Paper presented at the 第二届社会网与社会资本研究》, 载《青年论坛》2011 年。
- [18] 林南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和行动的理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19] 邹宇春、敖丹、李建栋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
- [20] Welch, M. R., Rivera, R., Conway, B. P., Yonkowski, J., Lupton, P. M., & Giancola, R. 2005.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trust", *Sociological Inquiry*, 75(4).
- [21] Lin, N., & Erickson, B. H. 2008.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 [22] Peck, M. S. 1998. *The different drum: Community making and pea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23] Wilson, P. A. 1997.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 learning agenda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rban Studies*, 34(5-6).
- [24]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Pop-Eleches, C., & Shleifer, A. 1997.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issue), 87(2).
- [25] Lin, N., Ao, D., & Song, L. 2009. "Production and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In R.-m. Hsung, N. Lin & R. Breiger (Eds.),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Communitie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26]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27] Heimer, C. A. 2001.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rust", In K. S. Cook (Ed.), *Trust in socie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28] Paxton, P. 1999.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29] 邹宇春、敖丹 《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资本差异研究》, 载《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5 期。
- [30] 边燕杰、李煜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 年第 2 期。
- [31] Uslander, E. M., & Conley, R. S. 2003. "Civic engagement and particularized trust",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1(4).
- [32] Lee, R. P. L., Ruan, D., & Lai, G. 2005. "Social structure and support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 *Social networks*, 27(3).
- [33] Freeman, L. C., & Ruan, D. 1997.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role relationships", *L'Année sociologique* 47.
- [34] Bourdieu, P. 1985.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Theory and society*, 14(6).

Utility Analysis of Social Capital: Its Effects on Generalized Trust of Urban People

ZOU Yu-chu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affects individuals' activities and whether achievement of goals. But the curvature of this affecting manner is unknown. This paper finds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a decreasing marginal effect on urban people's generalized trust. As social capital increases, the generalized trust level goes up at low social capital zone; but is leveled at high social capital zone. This finding betters off individuals' activities and sheds light on how to construct social network and measure social capital by those policy maker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generalized trust; curve effect

责任编辑 吴兰丽